

「向東看，往南走」： 開拓後危機時代傳播研究新視野^{*}

趙月枝^{**}

摘要

本文以後危機時代和全球權力關係轉型背景下的中國大陸傳播理論與實踐發展為主要參照，從四個層面討論「向東看，往南走」這一命題對啟動傳播研究理論想像的意義。首先，需要挑戰西方霸權知識／權力體系，在「南方認識論」等後殖民社會知識理論的引領下構建作為全球社會正義基礎的「全球認知正義」。其次，需要超越有關東西方文明分野的文化本質主義，反對將文化多樣性的想像限定在全球消費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內部，避免在中國與美國之間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內進行零和遊戲的層面上來認識「中國崛起」現象。第三，需要超越以西方、尤其是以美國為原點的「中心輻射式」全球傳播研究框架和議題設置思維定勢，把日益活躍的「東—南」和「南—南」間的傳播與文化流動當作重要的研究議題。最後，就中國大陸而言，需要把研究的視線從沿海與都市轉向內地與鄉村，並從「結構的歷史」和「技術的歷史」回到「人的歷史」中，在動態的歷史邏輯中將民眾的主體、他們的生活經驗、傳播實踐、社會想像和他們對霸權的反抗一同納入分析的視野。

關鍵詞：文化本質主義、中國傳播研究、西方知識霸權、全球資本主義

^{*} 本論文的寫作得益於受邀在 2010 年 7 月於國立中正大學舉行的「中華傳播學年會暨第四屆數位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作專題演講的契機。感謝國立中正大學會議組織者羅世宏、簡妙如和戴皖文等教授的盛情邀請，以及會議專題主持者、國立交通大學郭良文教授的熱忱鼓勵，感謝本學刊主編、國立台灣大學張錦華教授，以及本專題客座主編羅世宏教授的悉心支援和周到安排。也感謝學者同仁在國立中正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以及中國傳媒大學等不同場合對這個演講的不同版本的有益提問和評論。最後，我還要特別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卜衛教授和中國傳媒大學博士生龔偉亮，他們對論文提出了非常寶貴的修改意見。論文的主標題是英文會議主題「Looking East, Going South」的直譯和引用，與會議中文主題「從東看，往南走」僅一字之差，特此說明。

^{**} 趙月枝為西門菲沙大學傳播學院加拿大國家特聘教授，和中國傳媒大學長江學者講座教授，E-mail: yzhao@sfu.ca。

曠日持久的經濟危機和日益加深的生態與社會文化危機構成了當下世界現實的重要特徵。這些危機不僅事關經濟生存，政治民主和社會正義等重大議題，更涉及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以及族群與族群之間的包容這樣的根本性問題。

葛蘭西（Gramsci, 1979: 111）曾指出，危機為某些思想的傳播和某些問題及其解決方案的提出提供了契機。阿芒馬特拉（Mattelart, 1979: 25）也論及，在歷史上會出現一些「優選時刻」（privileged moment），它們「特別有利於針對現實的批判分析」。對傳播研究來說，當下就是這樣的時刻。由於傳播問題和中國問題是討論當下全球危機和探索未來出路的兩個關鍵領域（王維佳、趙月枝，2010；Zhao, 2010a, 2010b），擁有豐富人類歷史文化遺產，又有機會近距離觀察或零距離參與當下華人社會前所未有的社會巨變的海內外華語傳播學者，有擔當起自己的歷史責任的義務和條件。在後金融危機全球政治經濟環境下，和在中國等非西方國家的世界地位不斷上升的過程中，什麼樣的新思想、什麼樣的研究議程和什麼樣的研究問題會有利於我們應對世界所面臨的多重挑戰？什麼樣的「範式革命」能使依然在相當程度上依附於西方、將本地生活經驗和社會體驗放置在割裂的、專門化的西方知識體系當中的華語傳播研究建立起新的理論想像，從而對人類的傳播知識共同體有較大的貢獻？

2010年「中華傳播學年會暨第四屆數位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主題——「從東看，往南走：傳播研究的在地知識與全球實踐」Looking East, Going South: Local Knowledge and Global Practices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非常意味深長和令人興奮。它不僅充滿學術想像力，而且富有挑戰性、啟發性和前瞻性。它在為我們超越當下主導性的東、西方和南、北方知識／權力關係提供可能的同時，也通過對我們習以為常的「全球知識」和「在地實踐」這一表述的顛覆，引領我們重新審視「全球」和「在地」與「知識」和「實踐」之間的關係。基於這個主題和相關人文和社會理論所昭示的學術靈感，並延續作者近期在有關中國傳播研究方向與議程方面的一些討論（王維佳、趙月枝，2010；Zhao, 2009, 2010a, 2010b, 2010c, in press），本論文從四個方面闡述「向東看，往南走」對開拓後危機時代傳播研究新視野的意義。全球視角內中國大陸的傳播理論和實踐是本文的主要參照。

壹、超越主導西方知識體系霸權，尋求基於「南方認識論」的「全球認知正義」

首先，「向東看，往南走」不是簡單的地理方位轉向，而是在認識論上對現代西方霸權知識／權力體系的顛覆。印度後殖民學者查克裡巴蒂（Chakrabarty, 2000）在《行省化歐洲》（*Provincializing Europe*）一書中，倡導把歐洲知識地方化，以此挑戰作為西方現代性知識基礎的科學、理性等觀念和實際上是基於西方在地知識和全球殖民實踐的普遍主義。在《全球左翼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Global Left*）一書中，葡萄牙社會學家森托斯（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Santos, 2006）基於以「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為中心的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社會正義運動所調用和發展起來的多種在地知識，提出了「南方認識論」（epistemologies of the South），並在此基礎上倡導「全球認知正義」（global cognitive justice）。

在森托斯看來，「世界社會論壇」所隱含的替代性知識體系昭示，「全球認知正義」是「全球社會正義」的認識論基礎，沒有「全球認知正義」就沒有真正的「全球社會正義」（Santos, 2006: 14）。這是因為，西方資本主義和西方文化霸權的全球建立過程也是西方主導知識體系排斥、擠壓、甚至消滅世界其它知識體系的過程。這一霸權知識體系構建了以如下五個層面為核心的簡約主義認識論：(1) 單一的知識體系及其嚴密性標準（the monoculture of knowledge and rigour of knowledge）；(2) 單一的線性時間觀（the monoculture of linear time）和特定的歷史意義論與方向論，即基於特定的「進步」、「現代化」和「發展」等概念把西方核心國家置於世界歷史的前端，從而也賦予西方主導性知識、制度和社會性形式在世界體系中的「先進性」的地位；(3) 通過建立單一的社會分類邏輯及相關的社會性別、種族等範疇，掩蓋勞資關係和統治與被統治關係，並使社會等級與區別自然化（the monoculture of the naturalization of differences）；(4) 通過建立單一的普遍和全球尺度（the monoculture of the universal and of the global）使被定義為特殊和地方的東西無法成為可信替代；(5) 遵從單一的資本主義生產率和效益標準（the monoculture of the criteria of capitalist productivity

and efficiency），把基於市場力量的增長奉為最優選擇（同上引：15-17）。這一處於霸權地位的簡約主義認識論導致特定的有關蒙昧與科學、落後與先進、低劣與優等、地方與全球、非生產性與生產性的二元對立。「南方認識論」倡導由多種知識體系構成的知識生態（ecology of knowledges），倡導多維的時間性（multi-temporality or the ecology of temporalities）和歷史的多向性，多重的主體性與承認（the ecology of recognitions），多樣的普遍性願景（the ecology of trans-scales or competitive universal aspirations），以及多元的生產性標準（the ecology of productivities；同上引：18-28）。「南方認識論」認為，人類理解世界的知識是多元而豐富的，它們的總和大大超過了處於霸權地位的西方的理解。因為任何有關人與人之間和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都涉及不只某一種知識形態，所以，世間存在不只一種無知。在這個意義上，沒有絕對的無知，只有對某一種特定知識體系的無知。而且，對某一知識體系的掌握往往意味著對另一知識體系的遺忘和成為這一知識體系的無知者（同上引：19）。

在西方主導知識體系霸權內，科學實踐的優先和主導地位意味著那些基於這一實踐的處理人與人和人與自然間的關係的實踐也被賦予優先地位。由這些實踐導致的危機和災難被認為是可接受的，可以通過更多的科學技術措施來克服。正是在這樣的邏輯下，綠色科技成了解決生態危機的優先方案，精神科學成了醫治心理創傷的良方。而科學知識分配的不平等則意味著，對現實世界問題的解決方案必然傾向於那些掌握科學知識的社會群體。然而，不但科學知識的均等分配在全球資本主義體制下是不可能的，而且科學知識本身對解決現實問題也有侷限性（同上引：19）。因此，如果不能在不同的、相互競爭的知識體系間建立一種平衡，「所有旨在宣導社會正義的政策都會深化社會不公」（同上引：14）。

由於森托斯的「南方認識論」建構在「世界社會論壇」實踐以及這一社會運動實踐所調用與發展起來的知識基礎上，而中國大陸對在巴西和印度等國家舉行過的「世界社會論壇」的參與十分有限，中國和華語世界的知識和經驗就成了森托斯書中的盲點。同時，「南方認識論」在大部分中國學者眼裡，也許是太激進、太沒有相關性了。畢

竟，急於趕超「世界先進水準」的中國主流社會基本上還是「向西看，往北走」，不但對世界政治經濟精英雲集的達沃斯（Davos）「世界經濟論壇」趨之若鶩，而且往往唯西方理論馬首是瞻。更令人擔憂的是，在提升中國「軟實力」和大學學術管理日趨量化和官僚化的語境下，某種特定自然科學標準，包括 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這樣的知識評判機制及其本土化標準，正成為衡量「學術生產力」的最重要指標。這表明，某種特定的知識體系霸權在中國正在加速被內在化和制度化。傳播研究如何在這樣的學術政治經濟背景下實現認識論革命，從而為替代性社會秩序的構建奠定知識基礎，的確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不過，這只是問題的一面。向東細看，在主導性西方知識體系在中國霸權地位的背後，森托斯所闡述的「南方認識論」在中華文化傳統和中國大陸當下的社會運動實踐中有強勁的回音。從傳統中醫知識在事實層面的延續到中華民族融合以及構建中國現代國家的特殊知識和實踐，從過去以「赤腳醫生」為主體的農村健康傳播系統和「有線廣播」特定傳播形式到今天中國線民們穿越網路防火牆的豐富「翻牆」知識，我們都看到「南方認識論」在特定歷史語境中的東方詮釋。更重要的是，雖然中國的社會運動活躍分子的身影沒有出現在「世界社會論壇」上，如我在研究中分析過的那樣（Zhao, 2008, 2010b；Zhao & Duffy, 2007），在地的、針對中國在改革開放中出現的負面現象的社會抗爭活動一直在中國大陸此起彼伏，從來沒有中斷過。而這種抗爭的訴求，正是中國社會中的民眾——更確切地說，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政治實體中獲得了象徵性或形式上的主體性的「人民」——要求實質性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民主的訴求。

尤為相關的是，我們已經看到，當下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模式的不可持續性和由此引發的各種社會抗爭已導致中國大陸官方開始推進發展模式的轉型。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描述中國大陸當下發展路徑的轉型，以何種知識體系去理解中國正在發生的社會抗爭，如何分析這些抗爭運動所動員起來的在地知識和所產生的新的社會實踐，文化傳播系統和學者們又是如何勾連這一轉型和定義這些實踐的，對政治政策和實踐有深遠的影響。例如，對於社會抗爭運動，研究者是用中國主流媒體裡「群體事件」這樣的「去政治化」話語，還是用「權利」

抗爭和「市民社會形成」這樣的自由主義話語，抑或是延續之前需要兌現「人民民主」承諾的社會主義話語（呂新雨、趙月枝，2010）？如果我們拋棄單一的線性時間觀念和高度西方化的「傳統—現代」二元論，而是從「南方認識論」所倡導的時間多元性和歷史多向性的角度來分析，我們就有理由超越簡單的「進步」與「落後」標籤去追問：為什麼基於西方「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的「市民社會」和「自由主義憲政」（liberal constitutionalism）的政治願景就必然是進步和開放的，而期望兌現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制度承諾和嘗試構建新、實質性的「社會主義民主」就是保守和倒退的？

當下中國大陸的國家政權是二十世紀上半葉社會運動和暴力革命的產物。由於當下中國大陸政權所維護的官方意識形態並沒有公開否認國家的階級性以及「民主」與「專政」的「辯證」關係，「人民民主」是與「專政」二字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更何況，正像自由也可以作為暴政的幌子一樣（因此有羅蘭夫人〔Manon Jeanne Phlipon〕的著名悲歎，「自由啊自由，有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中國的「人民民主」政治演繹出了「文革」中部分政治和知識文化精英被「紅衛兵」和「革命群眾」殘暴「專政」的夢魘。因此，作為一種民主理論與實踐，「人民民主」和與之相關的「大民主」、「群眾民主」等政治詞彙成了政治保守主義者和精英民主主義者所恐懼的「暴民政治」的代名詞，在改革時代的中國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遇。而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意識形態霸權以及當下中國大陸政治生活中的種種非民主和反民主的現實更深化了「人民民主」在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話語體系內作為可選擇民主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和可信度危機。然而，正如華人政治學者林春（Lin, 2006）所論，從作為「人民民主」搖籃的中共革命根據地延安的農民民主實踐到體現「人民民主」重要部分的經濟民主的「鞍鋼憲法」，中國有關「人民民主」的理論和實踐遺產豐富而複雜，而它們與西方各種民主理論、包括「自由民主」理論的承接與揚棄關係更需要非簡約化的梳理與分析。「自由民主」是民主的一種特定歷史模式。我們有理由和可能想像不同模式的民主。事實上，在政治傳播領域，隨著西方資本主義和與之相關聯的政治、社會、文化和生態危機的加深，如何重新啟動「資產階級公共領域」

這一歷史範疇，如何在資本主義全球化語境下在西方「維繫民主」，阻止西方政治中「去民主化」的趨勢和克服「民主危機」，從而填補「民主赤字」和糾正「富媒體、窮民主」的窘況，早已成了西方批判學者的核心關注（Curran & Leys, 2000；Habermas, 1989；Hackett & Carroll, 2006；Hackett & Zhao, 1998；Kellner, 2005；McChesney, 1999）。

因此，在認識論上對西方主導知識體系霸權地位的挑戰必然呼喚相關的本體論和價值論變革，激發有關生存的意義、生活共同體（community）與政治文化共同價值的新想像。正如美國社會學家和漢學家趙文詞（Richard Madsen）所討論的那樣，「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這些社會理論概念不僅意指某種社會與政治組織類型，也應包含在更宏觀層面上對一種生活形式的描述。趙文詞指出，雖然一個完全建立在實用契約關係和個人利益基礎上的市民社會概念必然是不穩定的，但是，「現代西方社會理論卻從未能解析現代市場與那些不知何故使其得以運轉的前現代道德傳統是如何調和的這個問題」（Madsen, 1993: 188）。我在別處也已經論及（呂新雨、趙月枝，2010；Zhao, 2008, 2009），論者對哈貝馬斯（Jurgen Habermas）「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範疇的種種建設性批評與重構，包括女性主義哲學家南茜弗雷澤（Nancy Fraser；Fraser, 1992）所倡導的「後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理論」和傳播政治學家謝勒森格（Schlesinger, 1999）對哈貝馬斯原初範疇中所包含的理性主義和認知主義偏向的批評，為我們想像不同的民主模式和媒體公共性模式奠定了理論基礎。

更重要的是，不僅中國這樣的社會需要民主化和重構媒體的公共性，西方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更何況，這兩個過程在同一世界體系內密切關聯。那種認為西方已經達到了民主的境界，只有中國等非西方國家有未竟的民主化事業的觀點，只不過是線性時間觀和特定的歷史方向論，也即「歷史終結論」（Fukuyama, 1992）的另一種表述。例如，在討論「公共領域」和「市民社會」這些概念與中國的相關性問題時，趙文詞就不但主張從本體論和價值論的層面來理解這些概念的涵義，而且進一步指出：「公共領域概念並不一定非得與西方特定的一整套經濟與政治結構結親。它假設民主可以有不同的形式。與其說中國這樣的一個社會必須變得像西方，毋寧說西方自己需要尋找振興

其公共領域的新途徑。在現代（或後現代）條件下探索使公共領域制度化的新途徑把中國和西方以一個共同的追求連結在一起」（Madsen, 1993: 187）。也恰恰是在這層意義上，森托斯把放飛「認識論想像」（epistemological imagination）和「民主想像」（democratic imagination）當作構建他所倡導的新型社會學的雙翼：認識論想像容許對不同知識體系、觀點以及鑒定、分析和衡量實踐的不同尺度的承認；民主想像容許對不同民主實踐和社會民主主體的承認（Santos, 2006: 28-29）。

貳、超越東西方文化本質主義，重構文化多樣性和「另一個可能世界」想像

無論是查克裡巴蒂的「行省化歐洲」努力還是森托斯對「南方認識論」的闡述，挑戰西方中心主義知識霸權和把西方主導知識體系在地化的出發點和理論歸宿都不是相對主義，更不可把其與反現代、反科學和反民主立場相提並論並將其污名化。查克裡巴蒂（Chakrabarty, 2000: 42）就特別強調，「行省化歐洲」的努力不是呼籲對「現代性、自由主義價值、普遍主義、科學、理性、宏大敘事、總體性解釋等等的簡單和不可收拾的拋棄」。毋寧說，它凸現歷史性的鬥爭，並承認這些代表現代性和反現代性的實體、制度和表徵層面的鬥爭在特定條件下甚至會訴諸暴力。它還進一步展示，這種暴力不僅往往在夢眼迷幻般的理想主義光環下行使，而且在意義的構建、真理體制（truth regimes）的創立以及誰的和哪種「普遍性」獲勝等方面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查克裡巴蒂（同上引：42）指出，「行省化歐洲」的認識論訴求不應是文化相對主義。它更不應基於這樣的立場：那種把歐洲定義為「現代」的理性、科學和普遍主義是特定文化的產物因而僅僅屬於歐洲文化。從相關性思維（relational thinking）和東、西方相互構建的歷史和能動唯物立場出發，查克裡巴蒂（同上引：43）進一步提出，「行省化歐洲」的努力還有兩個基本立場：第一，歐洲給自己冠以「現代」這一形容詞的歷史是世界史中歐洲帝國主義史的不可分割部分；第二，這一把某一版本的歐洲等同於「現代性」的過程並非僅僅是歐洲人所為。作為現代化意識形態標竿的各種第三世界民族主義也一直是這一過程的「平等夥伴」。

同樣，在闡述「南方認識論」時，森托斯也特別強調，他所期望構建的不同知識體間更平衡的關係是一種非相對主義和非帝國主義的關係。他不是要賦予不同的知識體系以相同的合法性（validity），也不是籠統地要在任何具體的社會實踐中反對等級分層。這是因為，如果所有的知識都有同等的價值的話，那麼，所有基於這些知識的社會轉型都同等地合法，而這也意味著，它們同等地不合法（Santos, 2006: 20-21）。更何況，等級分層在具體實踐中是必不可缺的。森托斯的知識生態學要聚焦和解構的是不同知識體系間的具體關係，尤其是挑戰那些被主流歷史觀及其簡約主義認識論自然化和普遍化了的等級分層和權力主體間的關係。在此基礎上，他希望在科學和其它知識體系間構建新型的關係。這種新型的知識生態旨在給予不同的知識體系參與就如何建設「另一個可能世界」所進行的認識論論爭的「均等機會」，並使它們各自為建設一個更民主、更公正的社會以及社會和自然之間更平衡的關係作出最大化的貢獻。在這一新的知識生態裡，互補性和矛盾性存在於由不同的知識體系指導下的社會干預實踐之中，具體的等級在爭論與交鋒中形成，協調這些爭論的原則是在認知、政治、倫理各個層面的判斷，而且主導認知判斷層面的客觀性與主導倫理和政治判斷層面的非中立性，也即價值的判斷，不存在衝突（同上引：21）。

回到本文的論題，由以上討論我們可以導出，「向東看，往南走」意味著，我們要在超越文化相對主義的同時，超越有關東西方文明分野的文化本質主義，反對將文化多樣性的想像限定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和消費主義生活方式內部（趙月枝，2006，2007），警惕在東西方之間、尤其是中國與美國之間進行零和遊戲的層面上和狹隘民族主義的框架內加入「中國崛起」和「中華文明復興」這樣的話語大合唱。從人類文明發展的宏觀角度來看，東西方分野本來就是薩伊德（Said, 1978）所批判的「東方主義」的產物，是西方殖民主義意識形態和政治經濟文化霸權的一部分。1980年代以來，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意識形態悖論式相輔相成的「文明衝突論」又進一步把「文明」概念本質主義化了。然而，正如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所言，文明分野論是一種簡約主義理論，它以人的一種身份來掩蓋和替代人們身份認同

的多重性和複雜性（Sen, 2006a, 2006b）。森在 2006 年「北京論壇」上所作的主題發言中強調，從人類文明相互交融的角度來看，東西方文明的分野本身就是有問題的命題。畢竟，「代數」這個詞是源於阿拉伯語，阿拉伯數字開啓了數學之門，中國、印度、伊朗以及阿拉伯國家在歷史上爲西方哲學、數學和工程學的發展提供了知識資源，而這些學科在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發揮了重要作用，奠定了啓蒙運動和工業文明的基礎（人民網，2006）。實際上，當我們把基於阿拉伯數字的數學科學稱爲「西方」科學的時候，我們就已經在某種意義上成了東西方文化二元論和東方主義的俘虜與合謀者了。森呼籲，我們要強調的不是對文明的割裂，而是文明間的交融和不同區域的文明對人類文明共同體的貢獻（Sen, 2006a, 2006b）。

具體到我們所耕耘的傳播學科，我們也有必要意識到，現有的理論成就已經是東西方、南北方在地知識和全球實踐交融的結果。在這個意義上，這些知識看似是西方的，實際上是全球的。例如，在我自己所相對熟悉的傳播政治經濟學領域，雖然我們習慣於把現有英文文獻中的理論稱爲「西方理論」，但是，實際上，依附理論產生於拉丁美洲，而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等人的批判政治經濟學更是與發生在東方的社會主義革命和源於南方的反帝反殖民族解放運動有著直接與間接的有機聯繫。就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幾位理論奠基者而言，赫伯特席勒二戰間在北非的軍旅生涯和他所目睹的西方殖民主義給當地民眾帶來的災難對他的文化帝國主義理論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達拉斯史邁茲（Dallas Smythe）1970 年代到中國和南斯拉夫這些在政治地理上屬於東方的社會主義國家考察，並深受毛澤東的矛盾論的影響；而法語學術界的阿芒馬特拉夫婦（Armand Mattelart and Michèle Mattelart）更是與拉美的社會運動、尤其是智利在七零年代初的社會主義實踐有不解之緣（趙月枝、邢國欣，2007）。這些學者們在本國和國際舞臺上的學術和政治實踐使批判傳播政治經濟學理論知識與二十世紀以來在不同歷史階段、由不同社會政治主體推動的媒體民主化全球實踐（趙月枝、哈克特，2004）有機相聯。在這些批判政治經濟學理論核心的後面，很少有把東西方、南北方孤立和割裂開來的分析框架和文化本質主義傾向。相反，我們看到的是這些學者對他們自己所

處的西方社會的壓制性統治關係對本國和世界民眾的壓制和暴力的批判，是他們對東方和南方的民族解放和社會變革運動的理論與實踐的熱情關注，是他們對人類共同體超越資本主義體系及其不平等社會關係願景——另一個可能世界——的堅信。正是這樣的烏托邦理念指導著批判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發展，這種理論不僅關注傳播制度和傳播產業的問題，它還歷史性地將人民的主體、人民的生活經驗、他們的在地知識、社會想像和他們對霸權的反抗一同納入分析視野（王維佳、趙月枝，2010：24；Zhao, 2009）。

如果「科學無法脫離價值」這個命題成立的話，那麼烏托邦就從來沒有消失過。處在不同社會場域的人們只不過是提出了不同的烏托邦想像而已，例如自由市場烏托邦、科學主義烏托邦、共產主義烏托邦等等（王維佳、趙月枝，2010：24）。誠如東歐理論家齊澤克（Slavoj Žižek）在分析了此次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背後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時所論，「與其說意識形態烏托邦時代已經過去了，毋寧說，資本主義不受挑戰的霸權是由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恰當的烏托邦核心維繫的」（Žižek, 2009a: 77）。而森托斯更是一語中的地說，新自由主義是以反烏托邦面目出現的烏托邦（Santos, 2006: 11）。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要在認識到歷史並沒有終結，意識形態也沒有消失的基礎上，通過回歸歷史與社會，在對人類共同體所面臨的多重危機有強烈的焦慮感和對華語學人在人類知識共同體中應有的貢獻與擔當有充分自信的基礎上，重新討論我們應以什麼樣的烏托邦來建構我們的學術想像和實踐（王維佳、趙月枝，2010：24；Zhao, 2009）。在這裡，「重新發現烏托邦」特別指向一種在全球社會正義運動中所形成的對「文化帝國主義」的批判思想和對一種超越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理想社會的可能性期待。這同時也是一種自省式的學術努力。它堅持，「一種試圖實現自我社會價值的人類勞動的力量與一種將勞動降格為市場交換商品的力量正在進行著鬥爭」（Mosco, 1998）。這種鬥爭不僅存在於廣義上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與文化領域當中，也存在於學術界內部。包括華語學人在內的東方與南方知識份子坐擁上百年的社會革命歷史資源，共享建設替代性社會的成功與失敗的經驗，今天仍然在文明互動加速和壓迫與反抗並存的世界中尋求知識和從事意義生產。這

些人曾經是、也應該繼續成為替人類尋找出路的關鍵群體，是批判性世界主義（critical cosmopolitanism；Murdock, 2006）思想復興的希望。

當下，世界政治經濟文化和生態危機重重。可以說，羅馬在燃燒，社會正是需要思想界出來排憂解惑和提供新思路的時候。更重要的是，如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言，當整個世界體系裡的不同勢力處於極度不平衡和多變狀態的時候，小規模的社會動員就有非常大的影響，而這正是複雜理論（complex theory）所指的「蝴蝶效應」。因此，他說，「這是一個政治主體能動性可以戰勝結構決定主義的時刻」（Wallerstein, 2010: 141）。無論是在傳統中國社會還是在中國近、現代的歷史變革中，中國知識人士一直是很活躍的「救國救民」的政治能動主體。儒家傳統在尊奉讀書人精英身份的同時，要求他們超越自己的利益，「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而在中國共產黨的傳統裡，知識份子以革命者的政治主體身份投身社會變革，甚至主動地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在當下，也有不少華語學人在體制的重壓下以高度的社會責任感、難得的學術勇氣和強烈的社會實踐精神參與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民主化變革。這其中的挑戰精英主義的參與式民主思想和精神尤為難能可貴。他們不是先入為主地和居高臨下地對待研究對象，進而把自己的知識灌輸給被認為是「低素質」甚至是「無知」的下層民眾，而是以平等的身份和開放的心態去瞭解社會運動主體的在地知識，並讓自己的知識與社會運動主體的知識在互動中相互提升，從而達到改變現有不平等社會權利關係的目的。他們是森托斯的「南方認識論」在中國的知音。在大陸傳播學界，中國社會科學院卜衛教授在流動農民工和相關社會群體中進行的諸多參與式行動研究就是這方面的範例（卜衛，2009，2010a，2010b）。

如我前面論述所明示，挑戰西方主導知識／權力霸權並不意味著本質主義和相對主義地一概排斥任何「西方」知識。事實上，在西方學術界，批評學者一直在從事抵抗主導知識／權力霸權體系的反體制知識的生產。在當下，面對資本主義的危機和新自由主義全球意識形態的破產，批判學術界有關資本主義轉型的討論非常活躍。例如，在分析了當下的危機之後，沃勒斯坦（Wallerstein, 2010: 140）就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上宣稱，「問題已經不再是資本主義制度如何能修補

自己和重新向前邁進，而是，它會被什麼樣的制度所替代？什麼樣的秩序會從這樣的混亂中出現？」為此，他呼籲，就我們希望構建什麼樣的世界體系和如何轉型進行嚴肅的、開放的和真誠的學術對話和辯論（同上引：142）。與此相呼應，傳播學者麥切斯尼（Robert W. McChesney）與合作者福斯特（John B. Foster）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不是社會主義就是毀滅主義」（socialism or exterminism；McChesney & Foster, 2010）。而早些時候，東歐理論家齊澤克在分析了當代資本主義的危機和多重矛盾之後，更是旗幟鮮明地宣稱：「Communism, Again!」（Žižek, 2009a: 77）。他認為，有四個對立的矛盾使資本主義社會關係不可能永遠被再生產：生態災難，把人類知識通過所謂的智慧財產權私有化的不合適性，新科技發展、尤其是生物工程的社會和倫理影響，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新形式的社會隔離。在這樣的背景下，齊澤克認為，新的解放性政治主體將不再是某一個特定的社會主體，而是不同主體的爆炸性組合。經典的形象是無產階級「失去的只是鎖鏈」，而今，把所有人團結在一起的是，「我們面臨失去一切的險境」（Žižek, 2009b: 53-54）。

顯然，我們不是要回到史達林主義，回到中國的「文革」。這更不是為當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形態中的種種弊病辯護。相反，如麥切斯尼和福斯特所言，蘇聯和當下中國的經驗表明，「如果社會主義不是根植於普遍權力（popular power），就會事實上消滅自己，導致資本主義復辟」（McChesney & Foster, 2010: 10）。華語傳播學界呼喚具有批判與反思精神的學者。這樣的學者既不是歷史虛無主義者，也不是西方鸚鵡，更不是「中華文化」本質主義者和狹隘的民族主義者，熱衷於跟著官方口號做什麼「中國崛起」和中國「軟實力」的文章。相反，他們會站在批評世界主義的立場認識「中華文化」以及批判地總結中國追求社會主義的在地知識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實踐經驗，並在此基礎上展開認識論想像和民主想像這一對翅膀，使他們穿越時空自由地翱翔，為本土和國際傳播民主化尋找理論和實踐資源。

參、超越以英美為原點的「中心輻射式」研究議題

在研究議程上，「從東看，往南走」意味著超越以西方、尤其是以英國和美國為原點的「中心輻射式」國際傳播研究框架和議題設置思維定勢，把日益活躍的「東—南」和「南—南」間的傳播與文化流動當作重要的研究議題。在上個世紀九〇年代，在許多中國大陸學者的想像裡，世界就是西方，與世界接軌就是與西方接軌。當然，這是與西方的摩天大樓、高尚社區、和出入這些場所的中產階級接軌，不是與西方的殖民與侵略歷史和在美國某些社區，非洲後裔的青年進監獄的概率比進大學更高這樣的現實接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改革開放被認為是一個面對西方，背對第三世界的過程。

中國大陸的傳播研究，在引進西方傳播理論的同時，也把研究的視角聚焦在歐美，尤其是英美。在理論層面，「美國中心論」影響嚴重（趙月枝、鄧理峰，2009）。在實踐與制度層面，研究者們往往是聚焦《紐約時報》、BBC，和英美傳播法規所代表的制度設置。更值得討論的是，我們不是歷史地、全面地去研究這些機構和機制，把它們還原為本地實踐來理解和分析，而是把這些也是作為在地實踐的媒體與制度機制高度理想化、符號化、規範化，企望以此來型塑中國傳播制度。但是，與有些學者的一廂情願相反，有評論認為，中國想學北美，一不小心成了拉美。當然，這種表述對拉美也並不公平。事實上，拉美的許多正的和反的經驗，從高度商業化私人媒體和政權相結合的市場威權主義模式到自下而上的傳播民主化和草根媒體理論與在地實踐經驗，都非常值得華語傳播學者好好研究。

當然，超越以英美為原點的「中心輻射式」國際傳播研究框架和議題設置思維定勢不僅僅意味著對非英美國家傳播現象與制度的關注。這樣的研究議程還包括以下的含義：首先，在有關全球政治經濟秩序轉型的討論中，已經有人倡導，南方的國家在相互合作以改變世界遊戲規則方面有共同的利益，在這基礎上，可以形成新的象徵發展中國家團結和合作的「萬隆」，而且，在新的條件下，「第三世界國家」不僅有政治和道義上的影響力，而且有經濟上的實力來挑戰西方（Arrighi, 2007；Palat, 2008: 721）。在這方面，巴西、俄羅斯、印度

和中國「金磚四國」的出現是一個很值得關注的發展。由此引出了以下一系列有關傳播研究的問題：如果在上一輪的在全球範圍內爭取社會正義的實踐中，建立世界資訊傳播新秩序的運動是核心內容，那麼，在今天知識經濟和資訊資本主義的語境下，資訊與傳播領域在全球政治經濟民主化的過程中又會扮演什麼樣的角色？西方的媒體改革運動與東方和南方的媒體民主化運動如何連結、有益互動與相互促進？過去，西方學者們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力量及其進步性寄予了不切實際的期望。今天，我們對跨國市民社會及其作用是否也有浪漫化的傾向？

其次，面對西方消費市場萎縮和其他結構性的原因，中國政府正在大規模實施資本、技術、文化「走出去」的戰略，而亞非拉等地區是中國資本、技術和勞動力輸出的重點。我們如何能超越以我為主、甚至是中華文化中心主義的視角，超越工具理性和媒體與政府官員的視角，站在批判性世界主義的高度，檢視中國「走出去」的理論與實踐？比如，中非媒體關係是什麼樣子？中國的媒體是如何呈現中非關係和非洲社會、阿拉伯社會和其他非西方社會的？中國與非洲的傳播交往在非洲社會的階級、種族、和國內政治關係的重構中產生了什麼樣的作用？中國資本在非洲的發展過程中是否正在創造中國媒體宣稱的「中國奇蹟」？還是正在創造一種西方媒體宣稱的「新殖民主義」？又或者實際情況其實比這兩種說法都更複雜？如果說非洲在歐美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中被稱為「失落的大陸」，那麼中國能否為非洲帶來工業化，並成為讓非洲更好發展的「引擎」（Friedman, 2009: 19）？中國政府和中國企業在非洲都在進行什麼樣的媒介和電信基建項目？中國曾經宣稱堅持過的「第三世界國際主義」精神遺產是否會在中國與非洲以及全球南方和東方國家的經濟文化往來中產生影響？如 Suzanne & Ribet（2009）所綜述的那樣，中非媒體關係問題已在英語學術界引起了關注。另外，有人曾用「中美國」這樣的概念來描述中國和美國在政治經濟上相互融合。現在，又有人提出了「中印國」的概念。2010 年在新加坡召開的國際傳播學會（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CA）年會上還有一個這個主題的預備會議。但是，這樣的觀念有什麼實質性的涵義？更重要的是，後新自由主義時代國家和地區媒介政治經濟對於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和中國與

非西方國家的傳播政治有什麼影響？比如，中國官方媒體曾譴責印度媒體煽動反對中國的情緒，這一說法是否有根據？如果是，印度競爭充分並高度商業化的媒體生態又在其中扮演了什麼角色？

最後，對於「東—南」和「南—南」間的傳播與文化流動的研究不應該局限於國與國之間以及產業層面。民間的交往同樣重要。就像中國已經在世界一樣，世界也已經在中國。這其中的跨文化傳播問題大有文章可做，而且這其中錯綜交錯的階級、國族和種族文化與傳播政治尤其有研究和實踐啟發意義。例如，幾年前，上海閔行區一個叫西庭網球俱樂部和公寓（Shanghai Racquet Club & Apartments）的跨國社區裡的階級歧視規則，是由在南非種族隔離政策下長大的 Jeremy Goldkorn 先生首先在博客上曝光的。在 Goldkorn 的眼裡，這個社區裡讓家政服務女工坐後排而且要給房主讓座的班車制度與美國著名的種族歧視巴士——「羅莎巴士」有著相似之處（“Ayis overcome,” 2006.05.28, p. National.）。在這個事例中，美國和南非反種族歧視的在地知識被用於中國反階級歧視的實踐，而在中國的「外國人」成了推進中國社會平等的能動主體。另據正在北京皮村做傳播行動研究的卜衛教授介紹，2009 年 10 月舉辦的新工人文化藝術節中，來自美國的中國傳媒大學的訪問學生 Adan Avalos 拍攝並播放了有關中國流動兒童的短片《我的小升初》。很多中國的媒體人員和研究者都沒有注意到流動兒童因為戶口的限制面臨著轉學／升學和與家人朋友分離的痛苦。但 Adan Avalos 注意到了，並製作了短片，原因如他所說：「我是墨西哥裔，我小時候就是美國的流動兒童」（卜衛，上課講義，2010.07.14）。相對於沒有流動體驗的本國媒體人員和研究者，這位墨西哥裔的美籍學生更能在階層上與中國的流動兒童建立起認同感。這種超越國族和種族身份的「跨地域團結」（translocal solidarity）為我們構建超越狹隘民族主義和單一種族和國族身份認同政治的新國際主義或批判性世界主義提供了鮮活的「生活世界」（lifeworld）例證。還有，今天，在廣州，有一個知名的十平方公里之大的「非洲城」，或名「巧克力城」。面對一些當地華人對他們的種族歧視和廣州當局苛刻的境外人口管理措施，非洲商人們頑強地生存著，促進著中非商業和民間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海外華人社會深受西方社會「排華」政策和白人

種族主義之苦，他們有深厚的抗爭西方種族主義的知識積累。這些知識和經驗能為中國社會今天面對這些非洲和來自其他非西方國家的有色民族昭示些什麼？

肆、超越城鄉割裂，走向「新鄉土主義」？

就中國大陸傳播研究而言，鑒於中國東南部經濟市場化程度高，西北部與世界市場經濟整合程度低的現實，「向東看，往南走」，在地理上意味著向西看，往北走，將研究的視線從沿海與都市轉向內地與鄉村；而在社會學意義上，這意味著深入基層，進而「上山下鄉」，把研究對象從都市中產階級轉移到廣大的工人、農民和邊遠地區的少數民族。在方法論上，這意味著，有必要從「結構的歷史」和「技術的歷史」回到「人的歷史」中，從無休止的制度設計的爭論回到動態的歷史邏輯中，關注民眾在歷史中的命運變遷，關注他們對結構和歷史的影響（王維佳、趙月枝，2010：23）。

與「中產階級」的形成相對應，龐大的中國工人階級的形成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社會成果，傳播學者有責任和義務對中國工人階級給予更多的關注（Schiller, 2008；Qiu, 2009, 2010；Zhao, 2010c；Zhao & Duffy, 2007）。2010年春夏間中外媒體聚焦的深圳富士康工人接連跳樓事件可以被看作是勞動者以個體的身份對其生存狀況的無言抗爭和對生命尊嚴底線的捍衛。在解釋與應對這一問題時，不同的知識體系體現了不同的分析立場。當然，這些不同的分析立場也隱含了不同的解決方案。如卜衛教授（上課講義，2010.07.14）所分析，在大眾媒體報導中，心理學家將此看作是新生代農民工的心理問題——所謂的「抗挫折能力太弱」，企業家將此看作一場公關危機，政府將此看作一個社會穩定問題，管理學家將此看作工廠管理制度有待改善的問題，某些社會學家則站在勞工權利的角度將之看作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對工人的剝奪的結果。可是，在這個過程中，唯獨缺少工人的聲音。這不是一個中國的「底層」會不會發聲的問題，而是一個這些聲音有沒有被聽見的問題。在由北京新工人藝術團於2010年5月28日舉辦的「悼念富士康工友」民謠義演上傾聽了工人們自己的聲音以後，卜衛教授

意識到，這些新工人文化活躍分子甚至不需要就這個事件創作新歌，因為，「在以往的歌曲中，他們已經唱出了富士康那些年輕生命的故事，只要你去仔細傾聽」。她接下去寫道：

要求「生命尊嚴」，卻要以生命為代價，社會才能關注他們，這何等慘烈！不僅是跳下去的工友，還包括「討薪跳樓秀」、工殤的「開胸驗肺」等，都是以生命或年輕的身體作代價……不少媒體報導以「十連跳」、「十三跳」為標題，在這裡生命不僅被看作一個個冰冷的數字，而且還將人的生命戲劇化成聳人聽聞的「新聞」……應該反省的，不是青年工人的抗挫能力，而是單純追求 GDP 增長的發展模式給青年工人製造的「挫折」——讓他們的工資不足以養家，讓他們無法在城市安身，讓他們成為掙錢的機器，而沒有讓年輕工人看到希望；應該反省的，不是一個工廠的管理制度，而是以犧牲移民勞工為代價的發展模式及其制度性的冷漠和對這種不平等的社會沉默。（卜衛，2010c）

而一年前發生在中國老工業區東北的令人觸目驚心的「通鋼」（通化鋼鐵公司）事件，則印證了對大陸城市工人階級主體性和主體意識從傳播與文化研究角度進行分析的緊迫性。2009 年 7 月 24 日，在吉林通化鋼鐵總經理陳國軍宣佈由吉林省國資委支持和許可的通鋼私有化的方案後，數千通鋼工人聚集反抗私有化以致最後將陳毆打致死。我們沒有必要為暴力和殘殺開脫。但是，為了避免類似悲劇的產生，我們有必要追問，是什麼樣的知識和生活體驗，包括陳自己以往在與工人們交往時所調用的知識和話語，使他儼然成了這些工人眼中資本剝削權力的象徵？又是什麼樣的階級意識和正義觀念在支撐這些工人的行動？工人們對「社會主義公有制」有什麼樣的認知、情感和集體記憶？他們對自己所在的、曾經是「公有制」的企業的「改制」、甚至整個改革開放過程又有什麼樣的在地知識？這些知識、情感和集體記憶在事件中起了什麼作用？如果說讓廠區工人得以相互溝通的在地傳播網絡最終導向了大規模暴力衝突，那麼在這其中馬特拉（Mattelart,

1979: 28) 所說的「消極反抗」和「積極反抗」間的關係又是什麼？中國主流媒體和網路又扮演了什麼角色？媒體和網路關於這一事件的討論又如何影響中國工人的集體意識？更重要的是，中國工人對「社會主義國家」、「公有制」、「國企」、「國企改制」、「私人資本」這些制度設置有什麼樣的在地知識和價值認知？他們的這些知識與認知跟官員和主流知識份子等不同中國社會主體的知識與認知有什麼樣的關係？這些不同的、甚至可能是相互衝突的在地知識、集體記憶和價值認知對中國民主轉型有什麼樣的意義？與其它類似事件一樣，這一地方性的事件有沒有為中國工人主體性的重新獲得提供想像，從而已經或正在影響國家發展道路的選擇？傳播研究又能如何賦權工人，幫助促進草根的工人階級文化力量的發展？如果「人民民主」在制度設置上不僅包括政治層面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主權」，而且包括「經濟民主」（呂新雨、趙月枝，2010），這些問題的討論是否可以看作上文有關民主想像和不同民主模式討論的具體化和繼續？

孔誥烽（Hung, 2009: 24）指出，中國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並不是市場發展的一個自然狀態；相反的，它是以剝削鄉村、讓鄉村不斷為沿海出口加工業輸送廉價農民工為指導思想的發展模式所帶來的後果。因此，在中國大陸語境下，傳播研究必須正視城鄉、沿海內陸這樣的二元社會結構，並將傳播在中國失衡的經濟結構和新的社會分化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到議程上來，從而推進對有關傳播組織系統、政策和話語這三個層面上存在的城市中心偏見的批判。這也就意味著我們需要對中國大陸城鄉分化和「三農」問題中的傳播議題給予更多關注。畢竟，中國半數以上的人口仍是農民。當然這並不是要否認以城市的傳播研究的意義。只是，如呂新雨所言，任何沒有鄉村視角的城市研究都是需要檢討的，因為鄉村是瞭解現代中國歷史和社會變遷的一把鑰匙（呂新雨、趙月枝，2010）。儘管中國大陸的傳播系統在起步階段體現了以鄉村為主體的革命傳統，但是不可否認，最近三十年的改革實踐卻充滿著各種城市和沿海中心主義的偏見；考慮到中國傳播學是從英美移植過來的，而且大多的傳播研究者都生活在大都市，不可避免地對城市有著更多認同，說中國傳播研究有嚴重的城市中心主義偏見並不為過。

正如呂新雨（2010）所論，歷史上，中國城鄉之間是唇齒相依、互相哺育的關係。這樣的傳統關係被西方殖民主義和中國現代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興起破壞了。在毛澤東時代，一方面，城市和鄉村的分割是中國必須強制完成工業化的後果，但另一方面，以「政社合一」為基礎的人民公社的制度設計，卻正是為了克服以城鄉差別為代表的「三大差別」而進行的另類現代化的努力。今天，經過三十多年改革後，城鄉差別問題和城市貧困問題已十分嚴重。一方面，據中國媒體的一項調查，大約 80% 的 18-30 歲的農村居民認為，如果在城市，他們會生活的更好。人們逃離農村的速度在加快。麥肯錫諮詢公司預計，到 2030 年，中國城市人口將突破十億（戴維艾默，2010）。另一方面，隨著「白領」在城市化過程中的破產和「蝸居」現象的大量出現，隨著離開土地到了城市的農民工在城市生存難度的增加，鄉村的凋敝和城市生活的壓力使中國社會到了斷裂的邊緣（呂新雨，2010）。

近期日益激化的社會矛盾和生態危機讓我們越來越清晰地看到，沒有中國底層社會群體的崛起和他們所在的城市和鄉村社區的穩定，從長遠來看「中國崛起」無法實現，更奢談中國社會的和諧。具體而言就是必須讓工人農民，西部地區特別是西藏和新疆的人民和所有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被邊緣化的群體共享發展的果實，並在此過程中成為中國社會的主體——而不僅僅是作為城市中產階級「人文關懷」和「愛心救濟」對象的「他者」。只有當中國有效扭轉發展道路上的城市和沿海偏差，並且妥善解決三農問題的時候，中國工人階級作為一個整體才能在面對國內和跨國資本時有更多維護自己利益的能力。而這又將間接提高發達國家勞工階層相對於資本的地位。所以，克服中國傳播研究和傳播實踐中的城市和沿海偏差，提升底層民眾的話語能力不僅會對中國社會也會對世界政治格局產生深遠影響。李民騏（Li, 2008）曾預測，成就中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以及他們不斷上升的維權和組織能力，不僅會使全球權力關係的平衡轉向對勞工有利的一面，也會壓低資本利潤率，給資本積累帶來壓力，從而最終帶來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衰落。另外，日益加深的生態危機和文化危機也意味著消費資本主義作為一種全球性社會形態的侷限性和不可持續性。在這樣的語境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轉型就顯得更為迫切了。這不僅事關中國，也事關人類的未來。

這也對傳播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戰：資訊、傳播、文化部門在經濟復甦過程中到底扮演了什麼角色？如何從文化傳播的角度分析看待中國政府的「新農村建設」和「城鄉一體化」政策，它們有哪些希望和侷限？隨著互聯網的進一步普及，正在大規模推出的 3G 網路和數位電視工程將如何重塑中國的傳播格局？這些改變在何種程度上將會加劇或減輕現有的城市中心和沿海中心偏向？有關階級、地域以及各種本土和跨國民族主義的傳播政治會怎樣在中國社會和世界範圍內展開？當「中國崛起」的話語在國內和國外此起彼伏，相互強化的時候，也許我們也要警覺地追問，什麼是「中國崛起」話語背後的傳播政治？孔誥烽提出的中國是否會成為「美國的大管家」的命題，也許可以作為我們的清醒劑，從而避免幼稚地去慶祝全球資本主義從美國領導的西方轉向中國領導的亞洲：

中國主導精英階層作為世界經濟的出口者和債權人，已經建立起與美國統治階級相互寄生的關係，美國統治階級則試圖確保美國公民作為世界消費者和債務人的生活水準，竭力維護其國內霸權地位。雖然太平洋兩岸的兩個精英階級偶爾也會發生口角，但是他們擁有共同的利益，那就是維持各自國內的現狀，以及世界經濟不平等的現狀。（Hung, 2009: 24）

當然，期望中國的發展路徑在短期內徹底轉型到一個內需出口平衡，階級、地區、城鄉和政經關係更平等的狀態似乎不太可能。姑且不論其他新的條件，正如孔誥烽指出，這一轉型「需要政治層面的一個徹底調整，讓權力從沿海城市精英手中轉向農村草根的利益」（同上引：25）。從根本上說，這就意味著在實質上實現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雖然「工農聯盟」已經是被大部分中國傳播學者所遺忘的「口號」，但是，這一口號所希望解決的問題反而加深了。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呂新雨（2010）提出了「新鄉土主義」的概念，希望在保持鄉村的社區性和既有的文化多樣性、物種多樣性、生物多樣性和生存方式多樣性的前提下，發展建立在小農基礎上的有機農業，在使得鄉村能夠成為更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的同時，也重新建立新型

的城鄉互相哺育的互動關係。這意味著傳播與現代化、傳播與發展領域的「範式革命」，也意味著基於農民和鄉村的傳統知識和本土實踐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復興。而這正是我前面所述的南方認識論所倡導的。

伍、結論

危機和轉型的時代是我們把握機遇尋找新的出路、創造新的可能的時代。這裡讓我們再次回到馬特拉（Matterlart, 1979）的論點：重要的不僅是研究控制機制，我們也要研究各種反抗形式，以及各種控制和反抗力量的鬥爭。阿瑞吉（Arrighi, 2009: 79）看到了「中國農民和工人自古就有著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不能相比擬的反抗精神」；也正是這一傳統以及當時中國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所處的邊緣地位，在上個世紀血與火的殘酷鬥爭中出現了中國大陸的國家政權。也正是這一傳統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存在的平等與不公引發了此起彼伏的多主體、多層面和多種形式的社會抗爭，從而迫使中國政府在過去幾年內在「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等口號下調整其發展政策（Hong, 2010；Zhao, 2008），開始重新探索有關發展問題的在地知識。儘管這些政策本身存在自相矛盾之處，儘管它們遭遇來自既得利益團體的破壞和抵制，我對中國還是充滿了希望。

齊澤克（Žižek, 2009b）提醒我們，「民主」就是讓被社會排斥的人進入政治空間。因此，與其用中國大陸官方語言談論「兩個和諧」（和諧中國和和諧世界），談論「兩個民主」顯得更有意義，即民族國家內的民主和民族國家間的民主（國內民主和國際民主）。在這個歷史「關鍵時期」，為實現「兩個民主」，華語傳播學者在知識創新和實踐創新兩方面任重道遠。

參考書目

- 人民網（2006）。〈Amartya：全球化以及文明多元化——美國哈佛大學 Amartya Kumar Sen 教授在北京論壇上的主題發言〉。上網日期：2010 年 6 月 21 日，取自 <http://theory.people.com.cn/GB/40557/72701/72705/4966927.html>
- 卜衛（2009）。【傾聽勞動文化論壇】。未出版文稿。
- 卜衛（2010a）。〈民族誌教學：以第一屆「打工文化藝術節」的參與式傳播為例〉，《新聞學研究》，102：229-251。
- 卜衛（2010b）。〈在對研究的反省中進步〉，王怡紅、胡翼青（編）《中國傳播學 30 年 1978-2008》，頁 529-536。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
- 卜衛（2010c）。【「只是沒有聽到她的聲音」——參加五二八「悼念富士康工友」民謠義演有感】。未出版文稿。
- 王維佳、趙月枝（2010）。〈重現烏托邦：中國傳播研究的想像力〉，《現代傳播》，5：19-26。
- 呂新雨（2010）。〈新鄉土主義，還是城市平民窟？〉，《開放時代》，4。上網日期：2010 年 9 月 10 日，取自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9/201005/153014.html>
- 呂新雨、趙月枝（2010）。〈中國的現代性，大眾傳媒與公共性的重構〉，《傳播與社會學刊》，12：1-24。
- 趙月枝（2006）。〈文化產業、市場邏輯和文化多樣性：可持續發展的公共文化傳播理論與實踐〉（上），《新聞大學》，冬季號：1-7。
- 趙月枝（2007）。〈文化產業、市場邏輯和文化多樣性：可持續發展的公共文化傳播理論與實踐（下）〉，《新聞大學》，春季號：56-62。
- 趙月枝、邢國欣（2007）。〈傳播政治經濟學：理論淵源、研究路徑和學術前沿〉，劉曙明、洪浚浩（編）《傳播學》，頁 511-538。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 趙月枝、鄧理峰（2009）。〈中國的「美國中心論」與中國新聞業和新聞傳播學術的發展〉，《新聞大學》，春季號：39-44。

- 趙月枝、羅伯特 A. 哈克特 (2004)。〈媒體全球化與民主化：悖論、矛盾與問題〉，羅以澄、秦志希（編）《新聞與傳播評論》，頁 1-15。武漢：武漢。
- 戴維艾默 (2010.07.01)。〈港報文章：內地尚未做好準備迎接城市化〉，《參考消息》，8 版。
- Arrighi, G. (2007). *Adam Smith in Beijing*. London: Verso.
- Arrighi, G. (2009). The winding path of capital: Interview by David Harvey. *New Left Review*, 56, 61-94.
- Ayis overcome discriminatory shuttle bus rules. (2006.05.28). *China Daily*, p. National.
- Chakrabarty, D. (2000).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urran, J., & Leys, C. (2000). Media and the decline of liberal corporatism in Britain. In J. Curran & M. J. Park (Eds.), *Dewesternizing media studies* (pp. 221-236). London: Routledge.
- Fraser, N. (1992). 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actually existing democracy. In C. J. Calhoun (Ed.),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pp. 109-142).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Friedman, E. (2009). How economic superpower China could transform Africa.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14, 1-20.
- Fukuyama, F.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Avon Books.
- Gramsci, A. (1979). Analysis of situations, relations of force. In A. Mattelart & S. Siegelau (Eds.), *Communication and class struggle: An anthology in 2 volumes* (Vol. 1, pp. 108-112). New York: International General.
- Habermas, J. (1989).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ckett, R. A., & Carroll, W. K. (2006). *Remaking media: The struggle to democratize public communication*. London: Routledge.

- Hackett, R. A., & Zhao, Y. Z. (1998). *Sustaining democracy? Jour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objectivity*. Toronto: Garamon Press.
- Hong, Y. (2010). The politics of a socialist harmonious society in the aftermath of China's neoliberal development.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 311-328.
- Hung, H. F. (2009). America's head servant? The PRC's dilemma in the global crisis. *New Left Review*, 60, 5-25.
- Kellner, D. (2005). *Media spectacle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Terrorism, war, and election battles*. Boulder, CO: Paradigm.
- Li, M. Q. (2008).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demise of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Lin, C. (2006).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al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Madsen, R. (1993). The public sphere, civil society, and moral community: A research agenda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 *Modern China*, 19, 183-198.
- Mattelart, A. (1979). Introduction: For a class analysis of communication. In A. Mattelart & S. Siegelau (Eds.), *Communication and class struggle: An anthology in 2 volumes* (Vol. 1, pp. 23-70). New York: International General.
- McChesney, R. (1999). *Rich media, poor democracy*.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McChesney, R. W., & Foster, J. B. (2010). Capitalism, the absurd system: A view from the United States. *Monthly Review*, 62(2), 1-16. Retrieved August 5, 2010, from <http://monthlyreview.org/100601mcchesney-foster.php>
- Mosco, V. (1998). Political economy, communication, and labor. In G. Sussman & J. A. Lent (Eds.), *Global productions: Labor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pp. 13-38).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 Murdock, G. (2006). Cosmopolitans and conquistadors: Empires, nations and networks. In O. Boyd-Barrett (Ed.), *Communications media globalization and empire* (pp. 17-32). Eastleigh, UK: John Libbey.

- Palat, R. A. (2008). A new bandung? Economic growth vs. distributive justice among emerging powers. *Futures*, 40, 721-734.
- Qiu, J. L. C. (2009). *Working class network society: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information have-less in urban China*.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Qiu, J. L. C. (2010). Class, communication, China: A thought pie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 531-536.
- Said, E. (1978).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 Santos, de S. B. (2006). *The rise of the global left: The world social forum and beyond*. New York: Zed Books.
- Schiller, D. (2008). China in the United States. *Communication and Critical/Cultural Studies*, 5, 411-415.
- Schlesinger, P. (1999). Changing space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The case of the European Un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6, 263-279.
- Sen, A. (2006a). *Identity and violence: The illusion of destiny*. New York: W. W. Norton.
- Sen, A. (2006b). What clash of civilizations? Why religious identity isn't destiny. Retrieved August 7, 2010, from <http://www.slate.com/id/2138731>
- Suzanne, F., & Ribet, K. (2009). China-Africa media relations. *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5, 129-136.
- Wallerstein, I. (2010). Structural crisis. *New Left Review*, 62, 133-142.
- Zhao, Y. Z. (2008). *Communication in China: Political economy, power, and conflict*.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Zhao, Y. Z. (2009). Rethinking Chinese media studies: History, political economy and culture. In D. K. Thussu (Ed.), *Internationalizing media studies* (pp. 175-195). London: Routledge.
- Zhao, Y. Z. (2010a). China media colloquium: An introductory and over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 573-583. Retrieved August 8, 2010, from <http://ijoc.org/ojs/index.php/ijoc/article/view/821/433>

- Zhao, Y. Z. (2010b). Chinese media, contentious society. In J. Curran & M. Gurevitch (Eds.), *Media and society* (5th ed., pp. 252-270). London: Hodder Eductaion.
- Zhao, Y. Z. (2010c). For a critical study of communication and China: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 544-551. Retrieved August 8, 2010, from <http://ijoc.org/ojs/index.php/ijoc/article/view/756/430>
- Zhao, Y. Z. (in press). The challenge of China: Contribution to a trans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In J. Wasko, G. Murdock, & H. Sousa (Eds.), *The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Malden, MA: Blackwell.
- Zhao, Y. Z., & Duffy, R. (2007). Short-circuited? The communication and labour in China. In C. McKercher & V. Mosco (Eds.), *Knowledge worker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pp. 229-247).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 Žižek, S. (2009a). *First as tragedy, then as farce*, London: Verso.
- Žižek, S. (2009b). How to begin from the beginning. *New Left Review*, 57, 43-55.

“Looking East, Going South”: Exploring New Perspectives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the Post-Crisis Era

Yuezhi Zhao*

Abstract

Taking mainland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ies as the main point of referenc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four ways in which the idea of “looking East, going South” may ignite the theoretical imagination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the context of a major global power shift in the post-2008 financial crisis era. First, we need to challenge the hegemony of Western knowledge/power system and deploy “epistemologies of the South” or other post-colonial knowledge systems to develop “cognitive justice” as the epistemological foundation for global social justice. Second, we need to transcend a cultural essentialism that reifies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al divisions. This will enable us to imagine cultural diversity beyond glocalised versions of consumerist capitalism, while rejecting an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rise” in terms of any zero-sum gam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thin the global capitalist order. Third, we need to transcend the Western, especially U.S. centered “hub-and-spoke” pattern in glob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focus more on the increasingly active east-south and south-south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flows. Finally, as far as mainland Chines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s concerned, we need to shift research focus from the urban and coastal areas to the rural and hinterland regions. This also compels us to move beyond a preoccupation with the “history of structure” and “history of technology” to reclaim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 by locating their subjectivities, lived experiences, communicative practices, social imaginaries, as well as counter-hegemonic struggles within dynamic historical processes.

Keywords: cultural essentialism, Chines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Western knowledge hegemony, global capitalism

*Yuezhi Zhao is Professor and Canada Research Chair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 Communication in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Canada. She is also Changjiang Lecture Professor in the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China.

